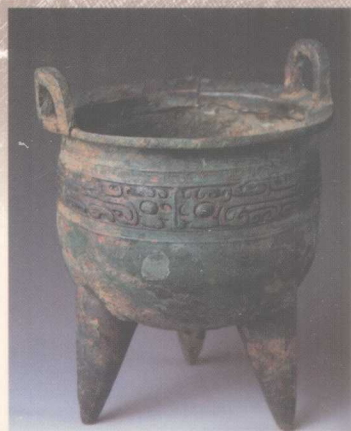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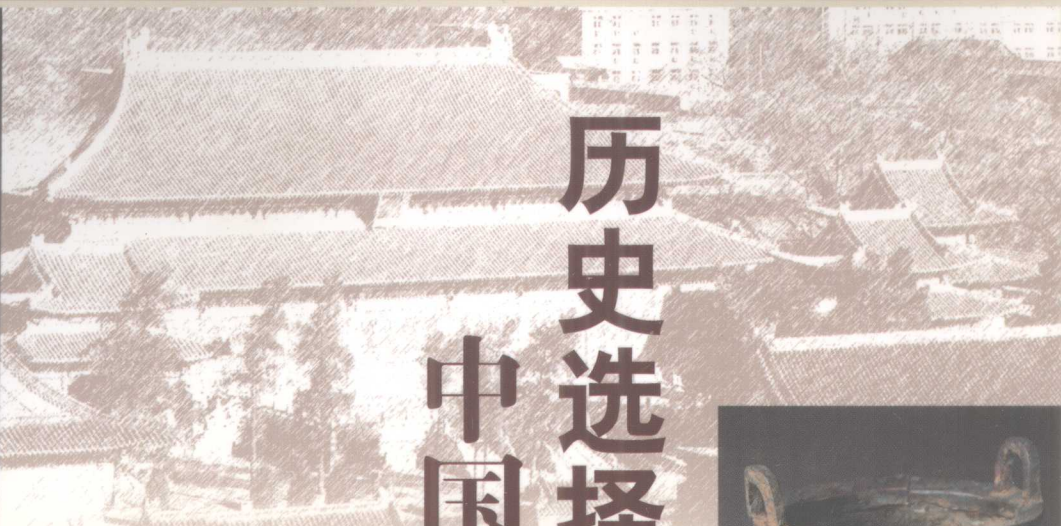


历史选择

中国模式

卜工◎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历史选择中国模式

卜 工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礼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代表。礼制的发生、发展与成熟、完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经历,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中国古代的礼制为什么如此发达?本书的研究表明,这种历史现象是近万年以来的家族组织所要求、联盟体制所造就的必然结果。本书明确地提出,中国古代的礼制分为上中下游,并将周礼某些制度的发生推进到新石器时代,展示出考古学书写中国早期历史的特殊能力。

本书只是创新性探索,适用于一切关注中国历史的人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选择中国模式 / 卜工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3-024611-0

I. 历… II. 卜… III. 礼节—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IV. 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304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宋小军 / 责任校对: 陈玉凤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3/4 插页 10

印数: 1—4 000 字数: 294 000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发现与发明（代序）

——为《历史选择中国模式》而作

科学出版社将要推出卜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第二部论著——《历史选择中国模式》，作为先睹为快者，在钦佩作者一系列精辟见解的同时，我想到最多的是“发现”与“发明”的关系。

谈及学术研究的发现与发明的关系，首先须从近代中国史学谈起。晚清以来，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近代中国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遗书和内阁大库书籍档案四大文献发现研究中国历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明“层累造成的古史”论断，形成了对传统史学强烈冲击的古史辨学潮。歆羡王国维等取得的成就，视及顾颉刚等存在的弱点，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史观公之于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祭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旗帜。此后，重视发现新材料的史料学派便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学派。

对于将史学的立足点放在新发现材料上的学术理念，黄侃则有其独到的理解。他与门生弟子谈学论道时讲：“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黄焯记录：《黄先生语录》，见《蕲春黄氏文存》，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人多认为，此议是针对当时在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史料学派而发的。1931年，黄侃还对前来拜访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讲过同样的话：“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黄氏讲的发现是指靠新发现的材料做研究，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容易做到；发明是指利用旧有的材料做研究，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不易做到。两者相较，发明更应推崇。

其实，同样重视新材料的王国维与傅斯年的史料观是有所区别的。

王国维的研究主要是据地下新发现的材料补正传世的纸上材料，即使用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代表著主要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简牍检署考》等。与王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氏强调对新发现材料的极端重视，基于发现新材料的史料史学取向，傅氏发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号召，于史语所内设立考古组，并真的到安阳殷墟去“找东西”，而且一找就是十年，收获颇丰。

与近代中国史学一样，在考古学的文明起源研究中，同样存在利用旧有的材料研究，还是立足新发现的材料研究的不同研究取向。当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首倡者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一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积累的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材料、郑州二里岗的商代早期材料、偃师二里头的夏代材料以及各地积累的新石器时代材料进行的。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突破贡献的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1997年）一书的研究，更多是建立在80年代中叶以后新发现的惊世骇俗的考古材料之上，主要有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江苏武进寺墩、浙江余杭瑶山、辽宁喀左东山嘴、辽宁建平凌源牛河梁、内蒙凉城老虎山、甘肃秦安大地湾、四川广汉三星堆等遗址的重大发现。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正式启动了“十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该项课题的预研究和正式研究中，特别强调对于新发现材料的重视，如其设定的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与精神文化的研究课题，寄希望于河南灵宝西坡、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安徽蚌埠禹墟等遗址发掘的成果。

夏鼐、苏秉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史相若，即利用新旧积累的材料从事研究，此类研究可视为“发明”性研究；而“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则与傅斯年领导的以史语所为核心的史料学派的研究相若，即在利用旧有材料研究的同时，更需要“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工作，此类研究可视为“发现”性研究。

考古学是一门“发现”的学科，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想要挖到的材料不一定能够挖到，没想挖到的材料可能不期而遇，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正是由于发现上具有偶然性的学科特点，考古学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就不能将立足点放在发现新材料上。

研究者先设定问题和观点，然后去发现新材料，其所得很可能并非所需，研究者若不是为将就问题和观点而委屈材料，就势必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考古学的学科性质要求其研究必须是于既有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业师张忠培时常讲的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就是这个道理。

考古学同时还是一门“限制发现”的学科，这是由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所规定的。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论证和说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往往是那些精华文物和承载精华文物的大遗址，对它们的保护又恰恰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设定一项或几项研究的课题，便根据主观想象动手动脚去找理想的精品文物和发掘大遗址，显然有悖于我国现行的文物工作方针。

谈到考古学的发现与发明关系，还想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考古学”。作为新考古学重要内容的实证论，主张使用“假设——演绎法”从事考古学研究，即先假定模式，再抽样验证、演绎规律。将这种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移植于人文科学范畴的考古学，在操作上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因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考古遗存属于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在没有可靠保证的前提下，不允许作为实验样本来操作，更不允许反复操作以验证其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新考古学在中国推广受阻，当与此不无关系。

研究和解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关键需要解决研究的理念问题。首先是理论与材料的关系，是以国外有关文明起源的理论，检视中国考古学的材料；还是在中国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认识，归纳模式，产生理论。其次是确定研究的取向，是寄希望于发现新材料，还是立足既有材料研究问题。

在利用既有材料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于发明有成就者首推苏秉琦。他的发明可成系列：中国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文明的形式有“裂变、撞击和融合”三种，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经历了古国、方国和帝国三部曲，古国出现的基础是古文化和古城，发展模式有原生、次生和续生三类型，蔚为大观。另外，还可举卜工的研究。他的第一部专著《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出版后，我曾写过《盘活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之我见》一文（《中

国文物报》2007年9月12日），文中讲到该书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发明性成果主要有：所谓“中国模式”就是礼制模式，礼制是通贯万年中国文明起源全过程的经脉；与文明起源的过程相伴，礼制经历了从古礼到酒礼、再到周礼的过程；礼制有古老的祭天祈年礼、古老的埋葬礼、祭祀祖先的祖礼、祭祀自然的社礼等多种形式；古礼有北方的萨满礼和南方的雉礼两个系统；历史时期维护等级制度的用鼎制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出史前时期的列刀、列璧和列瓶等制度。读者会欣喜地看到，卜工新著《历史选择中国模式》一书，对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积累的相关材料做出敲骨吸髓式的榨取，就以礼制为核心的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因进行深度开掘，由表及里，层层剥离，环环相扣，发明迭现。其发明主要有二。

其一，根据河北省武安磁山、湖南洪江高庙、辽宁喀左东山嘴、建平凌源牛河梁、浙江余姚汇观山等遗址的特殊迹象，推断专用的祭祀场所出现于史前的前仰韶时期并一直延续下来；根据黄河中游地区彩陶、黄河下游地区陶鬶、长江中游地区白陶、长江下游地区玉器等的特性，推断专用的跨地区、跨文化的礼器出现于史前的仰韶时期；根据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的奇数多孔石刀、江苏武进寺墩遗址 M3 的多节高体玉琮，推断表现军阶差别、记录军功晋升过程的列器形成于史前的仰韶晚期；根据青海乐都柳湾、青海民和阳山等墓地偏洞墓随葬的没有使用痕迹的上百件形态相同、大小相若、图案有异的彩色陶器，推断由送葬和随葬两种礼器表现的丧礼定制形成于史前的龙山时期。最终得出中国礼制是条长河，有上游、中游和下游，史前时期的古礼是上游，西周时期的周礼是中游，西周以后的礼制是下游的结论。

其二，作为本书重中之重的是通过对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河南密县莪沟北岗、陕西秦安王家阴洼、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村、内蒙古赤峰大南沟、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等墓地材料的分析，将史前时期的墓葬区分为单人葬与合葬两种形式，合葬再分为小型合葬墓、多人合葬墓、集体合葬墓，主要就多种形式的合葬墓的考察分析，得出贯穿史前时期全过程的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是父系家族，以及有特色、多层次以家族联盟为基础的联盟制度，区别于中国史前时期曾经存在过母系氏族的认识；通过对黄河流域的彩陶图案、长江流域的白陶和玉器图案的分析，得出陶器、玉器的装饰图案是祭祀符号的认识，区别于陶器、玉器的器表装饰图案为氏族图腾标志的认识。最终

得出中国礼制发达的必然性就是家族以及家族联盟对礼制的需要，即家族以及家族联盟是以礼制为核心的中国文明模式的社会基础的结论。

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国考古学文献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与大量积累的材料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研究成果稀缺，当下急需做的一是尽快整理和发表积压的材料，一是就发表的材料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卜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发明式研究，在理念和方法上给人以启迪，在观点和成就上给人以鼓舞。

20 世纪 80 年代，当有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喻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时，颇令这一时期的考古人兴奋和自豪。如果今天有人断言：中国考古学的“大发现时代”已经不再，也一定会令许多考古人感到沮丧和失落，此话并非危言耸听，这是由于考古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二是由于对有限的考古资源的保护方针决定的。若然，中国的考古人就理应面对现实，张开双臂拥抱考古发明时代的到来！

许永杰

自序

有的时候，开场白过于长，说了半天还不见主题，是会使读者失去兴趣的。为《历史选择中国模式》写几句话，可是又必须从《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谈起，因为两者是姊妹篇。

《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由科学出版社推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8年6月20日《中国文物报》揭晓2007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评选结果，《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荣膺年度最佳考古论著奖。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陈雍、中山大学教授许永杰、国家文物局王军、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先后发表书评，总结、提炼和深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因为这些认识特别重要，所以均作为附件收录在本书之中，也算是集思广益，以说明《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是集体的智慧。陈雍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许永杰和王军是我吉林大学历史系77级考古班的同窗好友，高蒙河是78级的师弟，我们同在业师张忠培先生的教诲下学习中国考古学，学术思想自然比较接近。

可能有人会产生误解，同门师兄弟之间评来评去难免有相互吹捧之嫌。然而，正如许永杰教授对他的研究生讲的那样，《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与相关的评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民间呼声。学术研究原本没有正统与民间的区别，可是有些学术团体和科研项目由于得到国家的资助与扶植，其成果往往无形中增添了许多神秘的或者是正统的色彩，在宣传的力度方面，在社会的影响方面，在知识的普及方面，在对外的交流方面都形成了某种天然的优势。显然，绝对公平的竞争即使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是不存在的。

可是，真理并不一定与正统发生必然的关系，只要认识具有客观真实性，符合历史的实际和社会发展的逻辑，不论是属于民间的还是正统的研究，都自然会被历史接受与承认，并且流传下去。这倒不是说“中国模式”就是真理。我始终认为“中国模式”不是简单的认识和学术观点，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正确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唯一途径。所以，当研究一旦发现了中国古代的礼制不仅存在着中游，原来还有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国特色就逐渐变得清晰了。人们熟悉的、文献记载的周礼，不过仅仅只是古代礼制的中游，中国还有个孕育周

礼的古礼时代！这是从来没有被认识、被发现、被说明的时代，然而，却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有怀疑者，有瞠目者，这并不奇怪。因为从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著作，包括那些享有盛誉的、已经进入高等院校课堂和学术研究殿堂的教科书，都没有意识到因而也没有能够认真地阐述这个时代，故而未能充分发掘出中国古代历史内涵的真正魅力与特色。许多年以来，照搬国外研究结论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独立思考，崇洋媚外的思潮由于中国近代化的落后而愈演愈烈。另外，中国考古学的作用尚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历史被文献禁锢的局面始终未能改变。考古学的作用从“补经证史”到描述历史走过了相当长的路程，依靠考古学资料写史的阶段刚刚来临。按文献来描绘中国古代的早期历史，虽然有根有据，由于年代方面的局限，其内容必不全面，难免出现将礼制的中游当作源头的倾向；用考古资料来堆砌和填充历史，虽然精彩纷呈，但无规律，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对中国早期历史和文明起源的研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的，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和各种学术流派也随之涌入古老的封建大国。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的学者便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熟悉的传统史学是过于追求微观的考证，过于注重微言大义的诠释，过于纠缠文献真伪的争辩；缺乏进化论思想的那种高屋建瓴的宏观目光，也缺少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有力支撑认识社会进程的大趋势，研究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于是很多学者大胆地放弃了传统，极其热情地拥抱和亲吻西方的学术思想，开始运用国外引进的概念研究中国的历史。由于从不怀疑西方学术观点和思想在中国的适用性，所以，非常关心“什么是”，而很少去问“为什么”，选择资料填充以固定的框架之中是主要的研究或工作，于是，囫圇吞枣，不求慎解，削足适履，肢解材料的现象就时有发生，而长此以往，便使中国古史的研究走向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另一个极端——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代替中国史实的研究成为正统与科学的至尊神明。洋教条因此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几乎是无处不在。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就成为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首要任务。

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理论战线，批判教条主义的呼声从来就不绝于耳。中国的史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但是，仅仅依靠猜测、怀疑和简单否定式的研究并不能从根本上清除教条主义。必须通过新的探索为人类的知识体系增加新的内容；必须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纠正以往推

测与假说的错误；必须通过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建设中国史观的体系，如此方能有效抵制教条主义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的影响，推动中国古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话要说回来。古代中国曾经有个古礼的时代的认识，能够得到古文献、古文字、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是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的关键之所在。古礼时代是社会号召能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控制能力、应变能力空前发展和全面提高的时期，是古老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质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仅是祭祀活动蓬勃发展，社会公共权利和相关的设施也在逐步地形成。特别是社会基本组织的结构与形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完成了从胚胎到定型的转变，而后来它的变化只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成长与成熟。因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并非如以往认识的那样可以径直的、简单的、不加分析的照搬国外的经验。什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点？什么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一句话，那就是礼制的发生与发展，成熟与完善。这个特点完全有赖于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只有正确认识这个基本细胞，才能理解它产生的特殊社会需求，才能客观地揭示古礼的历史必然性，才能科学地说明中国早期历史的特色。

中国古史研究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发展。用中国的材料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规律与特色业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与趋势。但是，究竟怎样的作为才能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在中国学术界尚存有不同的声音、方法和路径，孰是孰非并没有结论。可是，总有研究能够率先接近或达到历史真实的彼岸。这就是考古学研究的魅力所在。当前，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30周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大课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各学科、各领域都为此努力，因此，中国考古学便遇到了重新审视与检讨以往研究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新视野、新观点、新思想、新理念应运而生，重建中国古史体系的愿景才能够真正实现。

卜 工

2008年10月13日

目 录

发现与发明（代序）——为《历史选择中国模式》而作 许永杰（i）

自序 （vi）

走进北京的历代帝王庙（国庙引发出诸多联想） （1）

文明探源呼唤中国模式（资料基石线索与理念） （27）

礼制源头就在古礼时代（祭场礼器葬制有源头） （57）

家族组织孕育社会需求（两个阶段的几个问题） （103）

联盟体制铸就历史潮流（史料与发现相得益彰） （145）

考古研究揭示等级秩序（器物之配套藏有礼数） （171）

神奇礼制演绎特色史诗（制度精神蕴涵软实力） （191）

附录 （215）

附录一 一个从“礼”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读《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 陈 雍（217）

附录二 新思维与新天地——《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读后 孟 菲（224）

附录三 盘活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之我见 许永杰（226）

附录四 向世界展示中国模式——《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读书札记 高蒙河（231）

跋 （239）

走进北京的历代帝王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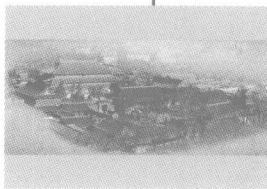
(国庙引发诸多联想)



大凡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数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经久不衰,在古代世界独树一帜,因之,以“礼仪之邦”而享誉全球。学术界公认西周以后中国的礼制进入到系统、规范的发展阶段,并对此后的社会生活、社会进程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先秦典籍关于夏商周三代礼制的记载是历史经验的长期积累、观念道德和行为准则不断规范的结果,由于其正统的地位和广泛的社会需求,在后来的历史岁月中礼制及其思想反复地被加以考证,其微言大义得到了深入的发掘,其理想境界被奉为终极的、至尊的目标,成为勤劳、朴实、忠厚的中国人民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道德操守和推崇的信条,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成为多民族大家庭的核心价值观,也成为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何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礼制的发生与发展、完善与成熟。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经历,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这就是《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之基本内容^[1]。中国古代的礼制是从古礼时代开始它漫长的历程,其发生大约是在距今1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年代之久远为甲骨文所见的商代礼制和文献经典的《周礼》望尘莫及。中国古代礼制不仅源远流长,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博大的兼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智慧和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代表,是唯一能够全面开启近万年以来中国古史大门的钥匙。

古往今来,这个历史上独特的传统是如何被维护和坚持的?又是怎样一代接着一代被总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这就不能不去中国北京的历代帝王庙作一番游览。因为,这座享有“一庙五千年”之美誉的、规模宏大而又庄严肃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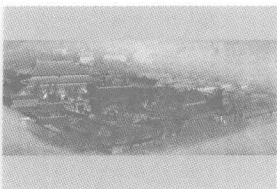


[1] 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

的历代帝王庙,是弘扬中华古老传统的丰碑,是中国古代文明精华的浓缩,是文明起源中国模式的殿堂,是见证历史的国宝^[1]。

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庙宇。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距今已有470多年的历史(图一)。它是我国明清两代集中祭祀三皇五帝、历代帝王及功臣名将的国家庙宇,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代帝王庙坐落在中国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北侧,占地面积21500平方米,古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共由3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景德崇圣大殿最为经典,九开间,五进深,其等级和规制与故宫乾清宫相同,是“九五之尊”皇家宫殿建筑的杰作,展示出清代乾隆最辉煌时期的面貌与格局。明清两代共举行过660多次国家祭祀大典,颂扬三皇五帝恩泽华夏的创世功德,颇具国家、民族与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和亲和力。此庙不是祭天祈年的场所,不是皇家的宗庙,也无宗教性质,供奉祭祀的对象不是神也非佛,而是中国古史中的先祖三皇、五帝,夏、商、周、汉、唐、宋、元、明诸朝代的帝王与功臣名将。在“景德崇圣”大殿中,三皇居中间处一龕,太昊伏羲居中,其前方按“左昭右穆”分别是炎帝和黄帝的牌位;此龕之左是五帝龕,右面是以夏禹商汤为排头的夏商40位王,再左是周代32位王,再右是汉唐36帝为一龕。辽宋金25帝和元明两朝23位皇帝分别牌位的两端(图二)。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王朝的领袖人物按照中华传统礼制——昭穆制度的精神供奉在一处,进行群体祭祀,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王朝会有如此惊人之创举?为什



[1]北京历代帝王庙保护利用促进会、北京富景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历代帝王庙研究论文集》,香港国际出版社,2004年3月;许伟:《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记述》,《北京文博》2008年第3期。本书对北京历代帝王庙的描述和认识均出于上述论著。

么在此庙中不供佛，不念经，不祭祖，不敬神，而专讲“礼”？为什么封建帝王如此推崇中华统序？这就必须回顾中国礼制传统的发展状况。

中国古代的祭祀体系始终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征是以神、祖、贤为祭祀对象。祭神，属于自然崇拜范畴，在世界各地普遍流行，应该属于人类共同性的特点。祭祖，是祖先崇拜，中国有一套特别繁缛的程序、仪式、祭法。祭贤，则是以前贤为祭祀崇拜的对象。《周礼》中已有明确的规定，《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古祀为社。帝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颡项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这是用文字的形式规定的祭祀前贤的具体标准，也表明这个祭祀系统的存在由来已久，为其后来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礼制自西周中期逐步进入到成熟的阶段，可是，西周晚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经春秋战国的战乱纷争，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初年周代的礼制体系已经破坏殆尽。按《史记》的记述，汉初虽然叔孙通按刘邦之命为恢复礼仪制度作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可圈可点之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曾想恢复明堂之礼，囿于窦太后崇尚黄老之学，这想法也就作罢了。汉成帝虽有动议修建明堂，可尚未实施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修明堂的事情又搁置下来。到了东汉，汉光武帝刘秀修建明堂、辟雍，儒学大兴，宣传中华传统礼仪的碑刻石经在中国很多

